

# 近代的超克

[日] 竹内好 著 孙歌 编  
李冬木 赵京华 孙歌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近代的超克

[日] 竹内好 著 孙歌 编

李冬木 赵京华 孙歌 译

\*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的超克/(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学术前沿)

ISBN 7-108-02192-7

I. 近… II. ①竹…②李… III. ①鲁迅(1881~  
1936) - 思想研究②政治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 文集  
IV. ①I210.96②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1768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625

**字 数** 306 千字 图字 01-2003-3074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4.80 元

# 学术前沿

##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的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创新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 在零和一百之间(代译序)

孙 歌

本书是从日文十七卷本的《竹内好全集》(筑摩书房,一九八〇——一九八二)中遴选出来的文字。在众多著述中选择出如此有限的文章,并且把它重新集结为一本具有有机关联性的著作,进而再通过这种内在的有机关联传达竹内好这个日本现代思想家的思想特质,对于编选者而言,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我不得不审慎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竹内好这位对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有着深刻理解力、对于日本现代思想的形成有着潜在影响力的独特思想家,他的思想特质究竟是什么?

竹内好诞生于一九一〇年,逝世于一九七七年。他在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除掉短期造访中国的经历以外,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曾经留学北京两年,并在一九四三年底被迫入伍作为侵略军的文化兵被派遣到中国的湖北;而在日本战败之后,他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他虽然在战后先后执教于东京的多所著名学府,并在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八年(一九五三——一九六〇)

之久,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却倾注于学院之外的著述、翻译、编辑工作,而非学院体制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说他不是学者,是准确的。而他没有嫡传弟子的那份身后寂寞,也因而具有了与学院派知识分子相对的文化品格。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竹内好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接近了鲁迅,并以此为原点使他的思想活动与日本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以思想的方式参与了同时代日本的重大现实课题。

竹内好从事思想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末期这一段时间,而他创造力的高峰期也正与一个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相重合。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年代前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把它从局部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的时期(对于同时代中国人而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改变侵华战争的性质);在这个时期里,竹内好和他大学时代的朋友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并于一九三五年创刊了《中国文学月报》;在这个刊物上,当时并不具有区别于旧汉学和支那学的独立学术能量的新生中国学,与汉学和支那学三足鼎立地推进了当时的中国研究。也正是在这个刊物上,竹内好与当时处于学术巅峰的优秀支那学家展开了不妥协的论战。在激烈的论战当中,如何接近中国这个研究对象,如何确定“外国文学研究”与母语文化的关系,构成了核心的问题。竹内好关心的是主体在充满张力的世界格局中真实的存在样态,翻译作为凸显主体存在问题的场域,被竹内好定位为不可以纯客观理解的思想课题;而遗憾的是,高度“技术化”地处理知识的支那学家并不具有理解这个问题的兴趣与能力,他们在回应竹内好的时候,仅仅肯在技巧的层面作出反应。因此,这场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两年的论争

始终未能摆脱它错位的性格,其结果,当然只能是不了了之。<sup>①</sup>

由于论战文字对于具体上下文的高度依赖性及其文体的相对封闭性,本书没有选择这部分内容,但是作为一个潜在的轴线,早年的论战经历却规定了此后竹内好思想发展的方向,并且锤炼了竹内好对于学院派操作方式的高度警觉。竹内好直到晚年都没有认可现实中的学院体制和这个体制所保护的知识生产方式,甚至断言日本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院派学术”,存在的仅仅是官僚化的伪学术。可以说,这种激烈的态度与他早年的论争经验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对于学院知识生产体制的根本性质疑,使得竹内好的知识立场彻底地非体制化,并且因而得以追究被体制规定了“起点”的那些问题的真实性。

本书选择的所有篇目,都与竹内好的这个知识立场息息相关。竹内好与他所热爱的鲁迅一样,并不是直观意义上的“战士”,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直接从事社会现实斗争的活动家;他的社会关怀与战斗精神表现为彻底颠覆知识领域内部的权力政治结构,并通过这种颠覆揭示现实社会权力关系的所在,促成精神层面的反思。由于这种工作方式的非直观性格,竹内好与他在《鲁迅》中描写的鲁迅同样的孤独,因为他所面对的理解障碍并不仅仅来自恶意的攻讦,更来自善意的误解。竹内好并没有如同鲁迅那样为信守这份孤独而“一个也不宽恕”,也因此并没有把写作嬉笑怒骂的杂文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式,但是在一

---

<sup>①</sup> 竹内好写作第一篇论战文字《目加田的文章》、对支那学家目加田诚提出批评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而中经与吉川幸次郎的论战,到他一九四一年十月发表《关于支那语教科书》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推翻支那学日益强大的知识生产方式。有关这场论战的过程和意义,请参照笔者《竹内好的悖论》(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章中的相关部分。

个根本上,他却与鲁迅相通:那就是打碎被知识和权力不断强化的“常识”,并在打碎这些常识之后,告诉善良的人们,如果你认同了这些约定俗成的前提,那么在你自认为是为正义而战的时候,或许很可能却正在与邪恶同谋。

—

让我们先从一篇短小的文章入手。《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是竹内好写于一九五二年的一篇短文,发表当时的标题为《无国籍的问题意识》。顾名思义,这是一篇讨论“国籍”与“国际”悖论关系的文章。竹内好敏锐地抓住了一个在知识领域里普遍存在的误区:国际性的学术就是超越了民族意识的学术。竹内好以相当尖锐的批判撕破了把“世界”置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常识”,坚持说“学问的国际性并非意味着学问没有国籍,无国籍的学问对于世界性的学问而言,也是一种累赘”。这是因为,“从终极结果上说来,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的。”

这篇短文的核​​心就是上述这短短的两句话。它不仅指出了一个易于被忽略的事实:“世界”存在于不同“国籍”的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以某种普遍性的形态存在于不同的国籍之上,因此脱离了自己的民族性只能意味着你附着于别人的民族性,也意味着你无法进入不同国籍间的相互关系,亦即脱离了“世界”,这便是“累赘”之所在;而且还指出了另一个同样易于被忽略的问题:学问尽管不能等同于民众的生活,却无法脱离它而独立存



在,在终极意义上,任何学问都无法逃避人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把这两个论点结合起来,可以推论竹内好的一个基本思想:只有从生活的角度进入学术,才能取得学术的国籍;而知识生产本身与生活的联系,恰恰体现为它的非观念性格;这种非观念性格不是取消观念操作,而是取消观念的实体化和绝对化。换言之,与生活建立了互动关系的观念,才具有知识生产的能动性。

竹内好在这里重复了他在一九四一年就翻译问题与吉川幸次郎论战时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没有主体存在的“客观学术精神”只能导致知识的虚伪与僵化。但是如果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竹内好在一九五二年的论述,并且把它单纯理解为知识论,那将会误解竹内好的意图。因为有一些没有浮现在这篇短文文面的时代课题,才是竹内好写作的真正动力,它们构成了竹内好对于知识生产的基本态度。

五十年代初期,是亚洲经历真正的民族觉醒的时期。由于冷战格局的形成,特别是美国通过占领日本、发动朝鲜战争等手段介入了亚洲的内部事务,这一切已然昭示了“国际”其实仅仅是大国称霸小国、强国操控弱国的一个口实而已。日本在战后 被美国占领,并充当了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帮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一九五一年围绕着是否签订日美旧金山和约的问题,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分歧。构成这个分歧的时代背景非常复杂:日本在战后虽然接受了东亚和东南亚被侵略国的军事审判,但把握了战争核心权力的 A 级战犯却是在东京的远东军事法庭被审理的,由于美国的操纵,在这个法庭上,太平洋战争构成起诉的核心问题。战后日本 的和谈问题延续了这个思路,日本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协约国和谈被视为结束战争的标志,而日本与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之间的和谈问题被束之高阁。这就是所谓

单独和谈与全面和谈的分歧点。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国拒不承认大陆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又不具有代表大陆的现实性,因此日本面对的首先不是和谈问题,而是承认大陆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当时英国承认了中国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在英美之间产生了分歧,但是日本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全面和谈”,而是追随美国进行“单独和谈”。一九五一年九月,参战的协约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署和平条约,其后日本与台湾、印度、缅甸等先后签署和平条约,但是拒绝与中国大陆签署同样的条约。这也是竹内好一直强调的“战争并未结束”的原因所在。在签署旧金山和约的时候,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并被签署,该条约以苏联和中国为假想敌,规定了美国军队在日本军事基地的合法性。因此,对于日本良识者而言,旧金山和约的签署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独立,反而把日本更紧密地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当时,在日本的主要综合性杂志上,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和谈的争论,而反对“单独和谈”的人占据多数。但是,支持单独和谈的人,并非全部出于反共动机,因为对于“国家独立”的理解在这个时期呈现了最为复杂的样态。

本书所收的《国家的独立和理想》一文,传达了这个分歧:以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明治教养人”,由于头脑中刻印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印记(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而言,是造就“日本无敌”幻觉的媒介),不能接受日本受到美国操控的现实,他们认为,只要在形式上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政治的直接管理,就完成了日本的国家独立;而战争中和战后成长的一代人却无法认可这个现实,他们认为,即使签订了旧金山和约,美国也依旧对日本掌握着操控权,更何况日本政府的独立是否真的可以保障日本人民生活在一个和平与民主的环境中,

这事情本身是一个疑问。所以竹内好说：“假如独立意味着恐怖政治，那么我们恐怕是不会选择这种独立的。”但是，反过来说，日本附着在美国的卵翼之下，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民主政治，尽管美国占领军在进驻日本之后的确引进了美国式民主制度，而这个并非植根于日本社会本身状况的制度，尽管在形式上保障了日本民众的各种自由，但是却为日本固有的社会结构与精神风土所消解的过程中，被改造为与二战时期日本社会结构并无根本性矛盾的东西。显然，无论是美国在形式上退出日本，还是日本仍然甘于依附在美国的权势之下，都不能通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

竹内好要处理的正是这个基本问题。经历了“二战”，亲眼目睹了日本在中国战场的野蛮行径，竹内好和他的同时代人多数意识到了日本政府所代表的“国家”的危险性；那么，在同样意识到美国占领并不能带来国家新生的状况下，如何为日本民族寻找出路？这正是困扰着竹内好那代人的“生活实感”，也正是竹内好追究知识生产的“国籍”问题的基点。

在此意义上，《国家的独立和理想》是一篇富有启发性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竹内好戳破了“国家独立”这样一个常识性的表象，引出了“什么样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这样一个深层问题。而在真正的独立这个层面上，问题发生了倒转，那就是形式上不具有独立表象的中国却可以在实质上具有独立的品格，而形式上将要获得独立的日本，却很有可能在实质上仍然无法独立。因为核心问题不在于表面上的国家主权，而在于这个主权是否被用来实现国家的理想。竹内好承认，把个人和国家类推为同一类对象，以个人的理想类推国家的理想，就学术而言难免过于粗暴；但是他表示说，他决心把这个不严密的推论坚持到

底。因为，“国家独立不单是学术上的问题，也是国民实践上的课题。”

关于这个决心的来由，竹内好并没有加以解释。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个把个人与国家置于同样层面来讨论国家理想与独立关系的做法，却具有挑战学院派方法论以上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挑战，他在论文开篇处批评专家的形式主义时就已做了简洁的交代）；因此，我无法摆脱这样一个知性好奇心：当竹内好决心与现行学院的操作规则势不两立的时候，他的内在动力是否仅仅来自对于专家式操作的不满？他究竟面对着什么样的基本课题？他所面对的那些思想课题如果不能用学院化的专家式操作解决，那么，他又能够以什么方式面对这些问题？

竹内好对于学院派专家的恶感可能和他早年与支那学家论战的经历有关。在那场论战中，竹内好遇到以“科学”之名排斥流动状况中思想课题的强大思维惰性。在学院派知识生产过程中，最致命的缺陷是缺少对知识内在张力的敏感，所有的知识都在再生产过程中被转化为确定不变的实体。当年的支那学家们确信知识不但有解，而且有确定不变的解，假如找不到这个正确的解，问题仅仅在于学者的功力，而不在于知识的流动性和紧张度；支那学家对流动和紧张的“知识”不感兴趣，因为只有排除了流动和紧张，知识才能是“科学的”定论而非“善变”的精神；而竹内好却坚持，所有的知识都不会是固定的，它们因主体的存在方式而存在，没有什么“客观的”可以无限接近的知识。因此，“考证”作为一个孤立的原则，根本不具有意义。相反，知识的状况性与普适性之间的悖论关系，才是它的真实存在根据。

假如把竹内好的这些论战态度回收到西方现代理论基本问题（比如现象学哲学或者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去，或者相

反,把它归结为对抗西方现代性的“本土立场”,那么一切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我宁可拒绝这个通俗易懂的知识模式对我的诱惑,因为那正是竹内好所拒绝的——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在这个拒绝中悄然地展开,在这个拒绝中艰难地推进,也在这个拒绝中找到了它们存在的理由。这个拒绝,用竹内好的语言加以表达,就是拒绝成为专家,拒绝进入学院派主流,拒绝那些虚假的“理性主义”。

在《国家的独立和理想》一文中,竹内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实上世界政府是不存在的,文化的问题亦然。只有不同民族的文化来参与,通过交流而创立世界文化,除了这一应有的世界文化形态之外,实体性的世界文化是不存在的。”

实体性的世界文化是不存在的,同理,实体性的世界政治也是不存在的。“世界”并非存在于各个国家之上,而是存在于各个国家间的力学关系之中,因此,假如国家尚可以用直观的方式加以确认(其实,直观地理解国家和它的机能同样不正确)的话,世界却不能够直观地理解为“就在那里”的存在物。至于那种认为否定了民族国家就可以打破封闭性从而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其实仅仅是无视现实状况的一相情愿——因为它依靠的逻辑是“世界”存在于国家之上,“国际”存在于国家之外。竹内好紧紧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世界政治格局迫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地行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无法保持自身的自主性,相反,丧失了自主性也就是丧失了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也就是丧失了国际性。正是由于学院式的“世界论述”把世界置于国家之上并把它实体化,对于国家自主性的理解才会被置于对立世界立场的位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

学家的要求》中才会提出“无国籍的学问对于世界性的学问而言,也是一种累赘”的看法。

但是,上述这些思想在日本战败、美国占领、东亚政治局势动荡的五十年代初期,并不仅仅意味着知识生产的方式问题。竹内好几乎在大部分文章中都强调“民众的生活实感”的重要性,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倡导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或者“知识分子传达民众的声音”。竹内好非常了解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代表民众”的迫切心情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反差,这就是他借助于一九五一年日美和谈之际推出的思想课题:假如国家在形式上的独立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假如民众的独立理想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独立而表现为实质上的独立,假如民众并非像知识分子那样敏感于是否和谈的问题,那么,追求国家独立的动力何在?

对于竹内好而言,一个国家法律和政治上的独立不是根本性的独立。只有那些超越了形式因而也能够包含这些形式的“实质性的独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竹内好把这种独立称之为“文化的独立”。这当然是个含混的概念,它和“实质”这个语词一样地充满了歧义。但是为了确保问题不被转移,我希望读者在此不要去追究关于文化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我们不妨在它的使用方向上去把握它:竹内好认为明治国家取得的独立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不是文化上的,因为它满足于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中却无视在国际政治中坚持自己的判断和意志;事实上,福泽谕吉的审时度势也正体现了这种“明治特性”;而中国与印度尽管一度在形式上没有获得国家的独立,在理念上却拥有文化独立的资源。竹内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断言,日本战后的被占领状态,是明治以来日本国家政治缺乏理念性的必然结

果,而不仅仅是战败导致的结局。

我相信,这就是竹内好坚持国家和个体一样也必须要有理想的原因。他使用相当直白的表现传达的这个看似简单的原理,却植根于深厚的难于简化的历史逻辑:明治国家由于缺乏这种“文化上的独立”,换言之,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跻身于世界列强的位置,甚至为了这种定位不惜牺牲日本对抗西方列强的实际可能性,这就导致了日本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内在的依附性。假如说现实政治迫使日本不得不选择这种“韬晦之计”,那么至少,在文化理念的层面,也还是应该并且能够保留主体的意志。竹内好是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作为范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在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中,“王道”与“霸道”的对立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即使在他落魄时不得不求助于日本之际,这个底线也是他希图固守的。竹内好在这位中国政治家身上看到的不是现实政治策略,而是具有强烈浪漫色彩的政治理念,他把这种政治理念投射到国家的理想这一课题中去,遂产生了对于日本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的反思,而他的痛切感受是,日本这个过于现实的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是能够支撑独立的理想。

竹内好的这种政治态度,与他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有关。本书特意选择了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写作的一篇支持日本对美宣战的宣言,就是为了呈现他的思想历程。在这里,我们遇到的不是先知先觉的英雄,而是在现实中苦恼和摸索的思想者。因此,一个有违阅读习惯的前提必须在此事先提示,那就是,竹内好关于国家独立的思考起源于他在战时的一系列思考和实践,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这篇政治不正确的宣言。在战后,这篇代表当时中国文学研究会写作的宣言一直被视为竹内好行状上

的一个污点,连他自己也含糊其辞地把这次“失足”解释为当时的政治压力所致;但是我宁可把它看做是竹内好围绕国家理想的存在可能性进行的一次不成功的思想实践。《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sup>①</sup>表达了竹内好对于日本作为一个小国敢于挑战强大的美国这一行动本身的无保留支持,字里行间充溢着浪漫的激情。竹内好写道:“我们日本不是惧怕强者的懦夫!当战刀向强敌扬起的时候,一切都得到了证明。”而为了这个不当懦夫的理想,他甚至放弃了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行径曾经发生过的那个疑问——“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甚至,竹内好还进一步把太平洋战争和日本的侵华战争连起来,宣布说前者使得后者获得了历史的正当性:“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为此,支那事变(即日本侵华战争)变成了一个“不是无法忍受”的牺牲。

竹内好以他自己的方式理解了孙中山对于王道的界定,这就是日本代表东亚对抗英美帝国主义的扩张。但是他显然回避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日本的侵华不仅不具有孙中山意义上的王道性格,甚至在战争陷入胶着阶段的时刻呈现出足以使英美帝国主义都自惭形秽的野蛮特性。在写作《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的高度舆论一律,竹内好对于中国战场上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是可以想像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竹内好支持太平洋战争的鲜明姿态,显然具有明显的非现实性格,他所作出的不是一个现实政治的判断,而是一个文化政治的判断:他关心的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是否有独立的

---

<sup>①</sup> 《竹内好全集》十四卷,筑摩书房一九八一,二九四——二九八页。



理念？在战争状态下，假如这个独立的理念只能表现为与强者对抗，那么这个对抗是否出现，又是否能够持续？

不言而喻，《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是一次失败的文化政治实践。它的失败不在于它支持了太平洋战争这一以卵击石的自杀性行动，而在于它没能有效处理现实政治中“日本”与军国主义政府的关系。在太平洋战争发动的特定时刻，当竹内好在这篇宣言中把自己的独立理念投射到日本对美宣战的现实事件中去的时候，他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是否代表了竹内好理念中的“日本”？竹内好理念中的国家独立是否真的可以由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来实现？

显而易见，在写作这篇宣言的时候，竹内好并没有余裕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自身也不得不被迫走上战场的时候，或许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宣言的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足以使他变得完美高大的文字。在现实选择的意义上，我们只能说竹内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今天这个时刻，从结果反向上溯历史，进而裁决竹内好当年的失败是容易的，但是这样做并不具有思想史的生产性——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竹内好的“错误”，有可能使刚刚开始呈现的问题被消解掉。作为编选者，我希望读者愿意和我一起思考和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投身于历史进程”这个对于每个人都存在的选择，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思想可能性？进而，在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时代错误”，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意义？

并不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能够介入他所处的那一段同时代史，同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效地进入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之前